

傳統與現代的衝突

——辛亥革命的雙重性格

徐 溯 楊小雨*

摘要：辛亥革命結束了封建王朝的統治，開始了民主共和國的新紀元，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從社會的經濟、政治基礎，到領導者、參與者、各方力量和民眾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模式，都充滿了舊時代根深蒂固的因素。這些因素使辛亥革命在具有革命性和先進性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有了整體意義上的不徹底的和消極因素。這一特徵是理解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關係的關鍵。

關鍵詞：辛亥革命 傳統 現代性 雙重性格

一、辛亥革命：傳統與現代的衝突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整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開啓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1905年以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不同形式的革命鬥爭，同時全國各地爆發了以爭取路權為核心的保路運動。1911年，以四川為中心的保路運動，由爭取路權發展為武裝鬥爭，全國性革命的高潮隨之到來。1911年10月10日，武漢革命黨人在起義新軍的支持下，在武昌發動了武裝起義，並取得成功，成立了地方革命政權。在武昌首義的倡導下，全國各地革命性質的政府紛紛成立，1911年底，為了統一引領全國革命形勢，各地推舉孫中山為臨時中央政府大總統。1912年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建國宗旨，推行了一系列全面革新的法令。1912年2月，以清帝退位為條件，革命政府與北方袁世凱勢力進行了議和，爾後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之後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因而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革命，標誌着革命黨人探索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儘管這種階段性的成功很快歸於失敗。

辛亥革命發生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裡，時代賦予了它新的內容和意義。一方面，辛亥革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它不僅結束了專制的清王朝統治，而且將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從改良發展為革命，並使之變成現實。辛亥革命之後的國家組織形式、政治

* 徐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助教。

楊小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體制架構、國家經濟政策和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出鮮明的現代性特徵，從國家體制本身到政府政策，反映了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實踐形態。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使整個社會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的解放。“過去專制主義是正統，神聖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殺頭。現在民主主義成了正統，同樣取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專制主義為人民所拋棄是沒有疑問的。”（林伯渠，1956）民主主義的思潮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以後誰再進行封建復辟，最終都要以失敗收場。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但對舊時代的否定是不徹底的，也是不可能徹底的，對新時代的開啓顯然也沒有取得完全意義上的成功。辛亥革命從社會的經濟、政治基礎，到領導者、參與者、各方力量和民眾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模式，都充滿了舊時代根深蒂固的因素。這些因素使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各方力量、民眾，以及整個社會，都帶有性格的雙重特徵，也使得整個革命本身帶有鮮明的革命性和先進性的同時，不自覺且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徹底的和消極的因素。這種不同層面而又帶有整體性的雙重性格歸因於特定時代條件下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傳統與現代的雙方面因素同時存在於各個社會主體的性格之中，這種自發帶有的雙重性格，引發從個體到整體意義上的傳統與現代的尖銳碰撞，而這種碰撞恰恰是我們認識辛亥革命，理解革命道路在中國發展與演變的關鍵。

二、辛亥革命領導者的雙重性格

革命黨人¹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代表着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將他們的救國主張從改良發展到革命。在這些革命黨人身上，鮮明地體現着性格的兩面性，而革命領導者的雙重性格，恰恰是決定整個革命雙重性格的關鍵因素。

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成長的歷史來看，在辛亥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先進性表現得最為充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從 1895 年廣州起義開始，在與敵方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情況下，以起義的形式與清政府進行了 10 餘次鬥爭，用流血和犧牲宣傳了革命主張。革命黨人“為人民謀幸福，反對清政府而死難”的精神被廣為推崇。中華民國誕生以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秉承了與同盟會政治綱領一以貫之的治國方針。新政權頒佈了各項政策法令（表 1），推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國方略。

南北議和後，孫中山以南京臨時政府的名義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臨時約法》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政治成果，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民主共和國方案的一次重要政治嘗試，確立了三權分立的現代政治原則，集中體現了南京臨時政府的政權性質，代表了革命黨人的願望和要求。

表1 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頒佈的政策法令

政治	保障人民的合法權利和平等地位。諸如人民享有選舉、參政等“公權”和居住、言論、出版、集會、信教等“私權”；禁止買賣人口、蓄奴，停止刑訊；保護華僑；給予女子參政的權利等。
經濟	保護工商業，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孫中山發佈命令保護私有財產和工商業者的經營活動；制定商業註冊章程、銀行暫行條例等規章，實行鼓勵興辦實業的措施；獎勵華僑在國內投資；提倡興辦墾殖業；廢除清政府的一些苛捐雜稅等。
文化	改革文化教育，實行資產階級教育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友愛為綱”的公民道德，廢除封建的忠君教育，改舊學堂為學校，教科書務必符合民國宗旨。教育總長蔡元培提出關於德、智、體等新教育思想和辦法，一掃封建舊教育體制。
社會風俗	移風易俗，在全社會樹立民主新風氣。孫中山自稱“公僕”，實行不分官階的低薪供給制。廢止一切跪拜禮節，改行鞠躬禮。他下令全國自命令到達20日內，一律剪斷辮髮，禁止纏足、賭博，嚴禁種植和吸食鴉片等。

資料來源：參見馬尚斌、胡玉海《中國近代史教程》，第376頁。

革命黨人的先進性和革命性，是當時社會環境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時代性的集中體現。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成長起來的革命黨人，在新舊之交的時代裡不可避免地帶有了特定時代過渡性的特徵，帶有鮮明的消極性和保守性。

首先，革命黨人將鬥爭的焦點集中在滿清統治者身上，是一種明顯的大漢族主義的政治動員，甚至在作為清政府的統治基礎的某些漢族鄉紳、地主、官僚身上寄託了過多的革命幻想。在《民報》等革命書刊中，宣傳革命的文章也大多將鬥爭的矛頭指向滿清政府，而對理性、民主、共和的議論和宣傳甚少。這種帶有濃厚民族色彩的宣傳，難以和作為領導者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地位和立場相匹配，也混淆了當時中國社會和革命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其次，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將革命的希望寄託在外國勢力身上，希望得到外國勢力的承認和支持，表現出了軟弱和妥協的一面。武昌起義成功以後，孫中山身在國外，當即認為武昌起義和革命政府應當積極向英國尋求支持。南京臨時政府的《宣告各友邦書》，也宣稱“深望各國既表同意於先，更篤友誼於後，提攜親愛，視前有加”。這種對外國勢力支持和幫助的幻想，充分表明了革命黨人對當時中國社會和革命主要矛盾認識的缺乏。及至後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又將革命的希望寄託在袁世凱和封建軍閥身上，一再喪失了革命的主導權。

另外，激烈的宗派糾葛和權力鬥爭始終貫穿於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內部。“光復會的李燮和在上海地區活動基本上局限於閩北的湖南籍巡警的圈子，陳其美則多利用浙江同鄉關係在上海活動，徐錫麟在安慶的活動也多借助於同巡撫恩銘的私交。孫中山、

黃興等人都試圖借助傳統遊民組織會黨，秋瑾、陳其美等都曾經與會黨成員有深入的交往，甚至被接納進入會黨。”（陳櫓，2003）這種情況發展下去，革命黨人在吸收組織成員方面不加選擇，而在自身的組織參與上，甚至與社會某些舊勢力混在一起，令革命黨人自身的革命屬性開始變得模糊。在這種話語下，革命黨人所奉行的三民主義更多地體現為民族主義，在民權和民生方面表現出了鮮明的保守性。

作為革命領導者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雙重性格並不是他們自身選擇的結果，而是其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基礎決定的，是特定的時代背景使然。也正是在辛亥革命中，他們的革命性與保守性並存的雙重性格得到了集中體現，對這種雙重性格逐漸認知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辛亥革命時期整個社會對革命的心態變化的過程。

三、各派系政治力量的雙重性格

除了作為辛亥革命領導者的革命黨人表現出鮮明的雙重性格，辛亥革命中包括外國勢力、清政府和袁世凱、立憲派等在內的各派系政治力量，在整個革命的過程中，都表現出了強烈的兩面性特徵。

對於外國勢力來說，辛亥革命以前近代中國的救國運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國勢力的干涉和扼殺，但是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外國勢力在名義上採取了相對中立的態度。由於武昌起義之後，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革命形勢向着有利於革命黨人的方向發展。外國勢力在這個關鍵節點上，進行了利益判斷。對於外國勢力來說，支持清政府和 support 革命黨人都存在潛在的風險，因此他們首先採取了以中立為核心的觀望態度。另一方面，各國在華勢力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衝突，對華方針的嚴重分歧也使得這種中立態度存在着利益格局的基礎。但是，隨着辛亥革命的發展，外國勢力也不可能始終扮演一個中立的、公正的第三者的角色，而必定積極參與到革命過程當中，並同時表現出明顯阻撓革命的一面。在這個時刻，外國勢力已經開始認識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可能直接威脅其在華統治，因此，拒絕承認革命政府而開始支持袁世凱，也就成了當時外國勢力的一種選擇。

對於由列強支持的袁世凱來說，也表現了對革命歷史進程產生複雜影響的性格特徵。必須承認，袁世凱當時掌握清朝的軍政大權，有很強的自主性和號召力。武昌起義後，袁世凱逐漸開始反對清廷，傾向革命黨，直至逼清帝退位，實際上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不僅得到了革命黨人的認可，而且對於穩定局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世凱在南北停戰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革命黨人的認可，黃興曾寫信給袁世凱，希望袁世凱“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非但湘鄂人民擁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方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中國史學會，1957：65）。在之後的南北議和中，雖然當時的革命軍已經佔據了武昌，南方各省也紛紛建立了革命軍政府，但是南方的革命力量尚十分分散，而且即使都集結起來，也還不具备推翻清政府的武裝實力。在這樣的情況下，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敦促清廷“俯

鑒大勢，順應民心”²的舉動，雖然包含着自身利益的需要和革命黨人的推動，但事實上構成了袁世凱在政治上轉向支持民主共和的關鍵。因此，袁世凱通電支持共和推動清帝退位，不僅是革命黨人的主動選擇，而且是革命力量對比和形勢發展的需要，更是推動革命的關鍵環節。在這個意義上，袁世凱在客觀上和事實上推動了辛亥革命的進程。當然，袁世凱終究不是進步力量的代表，其利益主張也不可能代表革命黨人的利益和要求，隨着政治局勢的發展，特別是就任大總統而大權在握之後，開始公然違背民主共和的建國宗旨，甚至公然投靠外國侵略勢力，走上復辟帝制的道路，實際上就走到了倒退的一端。這就是袁世凱的雙重性格。

對於被袁世凱逼迫退位的清政府來說，在革命形勢的發展、袁世凱的步步緊逼和多方妥協形成的優待條件下，清廷沒有負隅頑抗，而是選擇退位的舉動，在事實上帶有一定順應現實的特徵。清政府是辛亥革命的革命對象，清政府與袁世凱、革命黨人的妥協是明智的。

當然，除了革命黨人、袁世凱、清政府和外國勢力外，其他各勢力派別也帶有不同層面的兩面性特徵。例如：對於立憲派來說，在革命的初期，立憲派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支持革命共和。武昌起義後，張謇當選江蘇臨時議會議長，正式開始支持革命。張謇是立憲派的代表和傑出人物，他的行為選擇充分體現在革命形勢發展的情況下，立憲派放棄對清政府和君主立憲的支持，而轉向革命的一面。但是，立憲派產生於清政府內部，儘管其隨着早期革命形勢的發展，表現支持革命共和的一面，但這種支持畢竟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也是不可能長久的。南北議和之後，革命黨人為了制約袁世凱而希望定都南京，從這個時候開始，立憲派和部分舊官僚就開始走上了支持袁世凱的道路，在後期，某些立憲派人士甚至成爲袁世凱專制集權和復辟帝制的擁護者。當然，立憲派開始背離革命甚至走向反對革命的道路，不僅因爲袁世凱擁有雄厚的實力，也與遭到革命黨人的排斥有關。“革命派對立憲派懷有本能排斥，因爲立憲派從一開始就以溫和改良姿態出現，與反動陣營還存在着許多依存關係，但爲了穩定局面，對抗北洋軍隊的進攻，不得不與立憲派合作，並在奪取政權後借助後者的行政經驗與某些專業素養。革命派待大勢稍微安定之後，不欲立憲派高居大位。”（楊陽，2008）實際上，這也恰恰是作爲革命領導者的革命黨人雙重性格的集中體現。

四、民眾的雙重性

民眾是革命運動的社會基礎，從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來看，民眾的支援與否和社會基礎情況，是革命運動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辛亥革命過程中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民眾狀況，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首先，大多數城鎮居民對革命形勢的發展、對革命運動的宣傳，保持了相當濃厚的興趣。例如：革命黨人鄒容宣傳反對封建專制以主張革命的著作《革命軍》，“風行海內外，銷售逾百十萬冊，佔清季革命群書銷場第一位”（馮自由，1981）。城鎮居民對革命書

籍的關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大多數市民認識到這次革命可能與以往的改朝換代的鬥爭不同，而爲了驗證這種觀點，他們開始積極關心革命的理論、主張和宗旨。市民對革命的關心與宣傳是辛亥革命促進民眾政治參與的重要表現，也反映了民眾回應革命形勢的積極性。不僅如此，在市民中，以政治活動爲核心內容的平民社團，開始出現並活躍起來。除了平民的政治參與方面，辛亥革命對民眾的影響，或者說民眾對辛亥革命的回應，同樣是積極的和深刻的。辛亥革命後，南京政府頒佈了一系列消除長期封建統治下人身不平等關係的政策、法令和號召。“這些法令舉措，在廣大城市平民中引起了一定反響。革除陋習，移風易俗，成爲當時的新時尚。剪辮、放足等號召，城市平民也表現出了較大的認同和順應心理。”（馬克鋒，2002）更爲重要的是，隨着以革命爲核心的政治生活與民眾日常生活的距離越來越近，民眾的政治反抗精神也明顯上升。例如：“成都的大眾反抗呈現出各種形式，包括散發揭貼、公開講演，以及政治示威，有的是以個人行爲表現出來，但反映了其所在社會集團的願望和要求”（王笛，2001）。這種反抗精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對革命的並非真正理解，但與清末新政、戊戌變法等變革後的社會相比，辛亥革命引發下層民眾的回應還是相當大的。

儘管如此，辛亥革命畢竟發生在兩千多年君主專制統治結束的歷史節點上，民眾對辛亥革命的認知和支持都是有限度的。

對於革命宣傳來說，儘管革命黨人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但這種工作僅僅釐清了上層知識份子對革命的認識，對於大多數下層市民來說，他們對革命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停留在改朝換代的層次上。魯迅（1955）在小說《阿Q正傳》中寫到，“至於革命黨，有的說是便在這一夜進了城，個個白盔白甲：穿着崇禎皇帝的素”，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很多下層民眾將革命黨與反清復明的鬥爭聯繫在一起。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市民認識到代表着“民主”、“共和”、“政黨”這些抽象詞彙的新派人物推翻了皇帝，因此開始對這些人物關注和回應起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下層農民對辛亥革命的積極回應和嚮往，並不一定代表着他們對革命主旨和精神的理解與擁護，“實際上卻蘊涵着悲苦的無奈，農民煞費苦心地打出新的旗號，其實不過是爲了減輕一點租稅。借新名詞爲自己的抗租抗稅之舉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用他們以爲是革命黨人的道理來爲自己壯膽。這裡，既有對革命和革命後建立的政府的迎合，更有迫不及待的期待。”（張鳴，2001）而恰恰在這個意義上，下層市民的很多主張不但沒有得到革命黨人的認可，相反還被視爲小農意識和落後思想的代表。整個社會民眾希望得到的那種文明、和平及高尚的社會氛圍也沒有真正到來，於是普通群眾對社會的不滿，開始轉變爲對革命黨以至革命本身的批評。“對大多數普通民眾來講，意識形態和政治系統的性質並不重要，他們追求的是一個穩定的生存環境。”（王笛，2001）因此，當革命不能滿足作爲社會基礎的民眾的最原始意義需要，民眾很可能走到革命的反面，至少成爲革命的旁觀者。

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構中，社會的文化和風氣的生成受到這個社會的上層和精英的主導，因此，作爲社會基礎的民眾，其性格特徵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革命的領導者。

實際上，正是作為革命領導者和政治精英的革命黨人的兩面性，決定了民眾對待革命的雙重性格。當民眾認清了政治精英的雙重性格時，自然放棄了對革命力量的支持。民眾傾向的轉變使得以立憲派和舊官僚為代表的地方求穩勢力迅速佔了上風，在某種程度上促使了革命黨人最終的失敗。

五、辛亥革命的雙重性格與中國政治現代化

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包括領導者、各派系政治力量和民眾在內的多元主體，展現了不同層次的雙重性格。首先，作為革命領導者的革命黨人，是本國專制統治堅定的反對者，具有強烈的革命要求和鬥爭性，而由於受到外國侵略本國傳統勢力的束縛，這種條件下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領袖與革命力量，則帶有不可避免的軟弱和妥協的特徵，某些革命觀念和政策主張帶有明顯的保守性。其次，作為革命對象的清朝統治者，以及作為革命阻力因素的，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各派系力量，儘管在整個革命的過程中充當了革命的反動因素，但在特定的時期和階段，也表現出了新時代背景下不同程度的順應形勢和革新的一面，在客觀上推動了革命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作為社會基礎的民眾，既對封建統治和專制復辟帶有堅決的反對和抵抗，因而表現出對革命熱情的謳歌和支持；另一方面，也由於特定社會條件和力量對比的限制，社會民眾在政治參與上表現出多方面的消極性，甚至是旁觀者的一面。

這種不同層次的雙重性格的本質來源，是世紀之交特定時代條件下傳統與現代的激烈碰撞，這種碰撞及由此引發的辛亥革命整體的雙重性格，恰恰決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特殊地位。

（一）革命性和先進性是辛亥革命雙重性格的主導因素，因而決定了辛亥革命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和關鍵環節。

在辛亥革命的雙重性格中，以推翻舊的統治為代表的革命性和先進性是辛亥革命最主導的性格因素。“從實際社會效果而言，從社會影響的廣度和深度而言，辛亥革命打倒皇帝建立共和國所帶來的思想革命的意義遠非新文化運動可比。辛亥革命對全民族的民主思想啓蒙作用遠過於新文化運動。正是辛亥革命使王權政體崩潰，才使原來的社會政治與文化道德亦因之解體。如此，才提供了五四精英攻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結構上的可能性。”（張濤，1996）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和關鍵環節，其“破舊”的實踐是十分成功的。當時中國面臨救亡與啓蒙的雙重歷史使命，然而在由半殖民地向殖民地轉變的歷史進程中，救亡的使命壓倒啓蒙，而辛亥革命恰恰成為這種真正救亡意義上的原點。

(二) 辛亥革命整體性格的雙重性，決定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軌跡不可能沿着其開闢的道路發展。

辛亥革命在彰顯革命性和先進性的同時，其自身領導力量的雙重性格、參與力量的雙重性格、社會基礎的雙重性格，都決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只能處於一個承先啓後的地位。辛亥革命最大的意義不在於革命主張和革命方案本身，而在於其所帶來的社會思潮的革新和社會結構的重構。在這個意義上，辛亥革命所倡導的民主共和國救國方案的歷史地位，更多地表現為否定和顛覆傳統的封建統治，並推動社會變革的新格局的形成，而非這種方案的內容本身。這種方案本身的雙重性格決定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軌跡不可能沿着這種道路發展，而需要性格更加徹底和堅決的領導力量。事實上，辛亥革命最大的意義就在於推翻了封建統治，傳播了革命思想。也就是說，辛亥革命不是開闢了通達的道路，而是“開風氣之先”。

(三) 辛亥革命的雙重性格，構成了中國政治統治以中性及調和為主要特徵的政治生態的發端。

政治是鬥爭和妥協的產物，從武昌起義到南北議和的辛亥革命，其具體過程深刻展現了各派政治力量相互妥協的行為選擇，也表現了各個權力中心中性及調和的政治特徵，使整個革命沒有極端的色彩。這種政治生態既與千年來中國中庸的社會文化相適應，也構成了後世中性和調和的政治生態的發端。特別是在今天的中國，國家政治權力對社會各個參與主體表現出了鮮明的調和特徵，利益的和諧、均衡、調和是當下政治生態的重要內容，這種政治生態極大地增強了體制的包容力，使多元政治力量的關注點統一到一個相同的焦點上。

總之，處於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關鍵節點上，辛亥革命被歷史地賦予了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使命。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完全承擔起啓蒙和救亡的歷史使命，但其彰顯的民主與共和的社會思潮深刻教育了社會各個階層，特別是一代革命者，進而在政治現代化的發展史上開闢了民主與共和救國方案的通道。另一方面，辛亥革命表現的複雜性格與特徵，也在革命者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進一步強化了政治變遷的複雜性，進而通過革命的主導者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

註釋：

1. 武昌起義之前的“革命黨人”泛指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等為代表的以資產階級革命為救國主張的鬆散的政黨聯盟。其中，興中會和後來的同盟會是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事實上的領導核心。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先後改組和建立了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這一時期的“革命黨人”指以孫中山為核心的繼續堅持革命主張和反袁鬥爭的政治力量。全文下同。
2. 為袁世凱聯合內閣大臣等人在給隆裕太后的密折中對清廷的勸告，參見張謇（1931：25）。

參考文獻：

- (1)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2) 尹全海，〈列強與辛亥革命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1991(6)。
- (3) 王笛，〈街頭政治——辛亥革命前後的下層民眾、改良精英與城市政治文化〉。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 20 世紀的中國——紀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 1665-1690 頁。
- (4) 王善中，〈關於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的三個問題〉，《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4)。
- (5) 林伯渠，〈在孫中山先生誕辰 90 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6-11-12，第 2 版。
- (6) 居偉忠，〈辛亥革命後社會心態衝突與社會發展方向的變化〉，《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1)。
- (7) 馬克鋒，〈辛亥革命與民眾動向〉，《廣東社會科學》，2002(6)。
- (8) 馬尚斌、胡玉海，《中國近代史教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 (9) 陳櫓，〈主體與目標的錯位：辛亥革命與傳統因襲〉，《江海學刊》，2003(3)。
- (10) 張海鵬、鄧紅洲，《辛亥革命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 (11) 張鳴，〈民意與天意——辛亥革命的民眾回應散論〉。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 20 世紀的中國——紀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 1644-1664 頁。
- (12) 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13) 張濤，〈辛亥革命——傳統政治現代化的方式〉，《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5)。
- (14) 張謇，《張季子九錄·政聞錄》，上海：中華書局，1931。
- (15) 馮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
- (16) 楊立強、沈渭濱，〈略論辛亥革命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5)。
- (17) 楊陽，〈評析立憲派在辛亥革命時期的雙重作用〉，《經濟研究導刊》，2008(17)。
- (18) 魯迅，《阿 Q 正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 On the Dual Character of the 1911 Revolution

Xu Su Yang Xiaoyu

Abstract:

The 1911 Revolution toppled the Qing government, putting an end to millennia of feudal rule in China and opening up a new epoch of democratic republicanism in Chinese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as also permeated with old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n almost all aspects, including it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the outlook and actions of its leaders, participants and the masses. These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evolution's inconclusiveness and shortcomings, in spite of its overall revolutionary and advanced nature. Dual character, thu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of China.

Key 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tradition, modernity, dual character